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风雨人生】	四十多年前的“七国特务”往事	汤 涛·姚 楠
【往事非烟】	梦忆巫山	王 康
【不堪回首】	陶铸之死	曾 志
【冷暖人间】	没有家的日子	罗点点
【动乱年代】	解读“大杂院”	华新民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风雨人生】

四十多年前的“七国特务”往事

· 汤 涛·姚 楠 ·

（冯康（1920·9·9—1993·8·17）是享誉国际的应用数学大师，他在1950年代后期独立于西方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理论，1980年代末期，他又提出并发展了求解哈密顿型方程的辛几何算法。本文摘自《冯康传奇》一文，涵盖了冯康先生在十年文革及其前后的经历，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三室。——编者）

如同发现了计算数学领域的“桃花源”，有限元方法的发现让冯康和他的团队在计算数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豁然开朗。正当冯康和他的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进一步探索有限元新的研究方向时，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席卷到了“三室”。

1965年，七组组长黄鸿慈被派往河南信阳进行“四清”，其他的业务骨干也相继到农村“四清”。农村的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是由1963年2月的中共中央全会决定的农村政策。随后，第七研究组解散，《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停刊。同一时期，三室的其他研究组的科研工作也开始涣散。当初热火朝天的干劲与昼夜奋战的激情骤然间降到了冰点。

本该是上下团结一心，撷取更多更辉煌科学果实的时候，却眼见辛辛苦苦组建的计算数学团队日渐离散，冯康遭遇了事业方面的第一次打击，心痛不已。

令冯康心痛的不仅仅是事业，还有他的家庭。在此之前，伴随着事业的喜悦与悲伤的交替，冯康的第一次婚姻走到了终点。如同数年前平静的结合到此时平静的分手，第一次婚姻并没有带给冯康一丝轰轰烈烈的激情与撕心裂肺的痛楚。

事业的打击、家庭的失败已经让冯康的人生进入了冰冷的低潮期。然而冯康并没有想到这些仅仅是山雨欲来的前奏曲。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随后北京大学饭厅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

#### ◇ 苏州“告别”

人们之所以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灾难与内乱。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停滞、倒退，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承受了这场灾难的不幸与创伤。“文革”对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更是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校园内停课、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教学科研工作陷入瘫痪。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由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打倒。由此，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学术精英。知识分子不仅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而且还要遭受羞辱与残酷的折磨。一大批知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不堪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纷纷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1966年8月，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跳太平湖溺水身亡；9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在上海服毒自杀；1968年10月，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的赵九章在北京中关村服毒自杀；1968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1969年1月，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10月，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狱中自杀……。自杀与受迫害致死的学者精英不胜枚举。

文革一开始，计算所三室的科研工作就基本停止了，原来分工明确的各个小组被迫解散、重新组合为各个“战斗队”。黄鸿慈、黄兰洁、王平治等家庭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人自己组成了一个“战斗队”。作为三室学术权威的冯康也首当其冲被造反派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典型进行批判。

1967年，一直与冯康住在北京的母亲严素卿去世了，这令冯康悲伤不已。母亲为冯康四兄姊辗转操劳了一生，最终也没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临终前，母亲还是和冯康居住在中关村一个狭小的两居室的单元里，冯康觉得愧对母亲。

母亲走后，冯康开始一个人独自生活。不久，弟弟冯端从南京赶到北京看望他。在和冯端的谈话中，他说过一些江青太女人气之类的话，表达了对江青的不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文革时期压在冯康心头的一大隐忧。

1968年3月，“杨余傅”被打倒，文化革命进入了第五个高潮。杨、余、傅是当时军队三位高级将领（分别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编注）的姓氏，他们被打倒，表明军队也被严重地卷进了这一运动。5月，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全国又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文革中历时最长、受害人数最多的一次运动。军管会和工宣队对在文革中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

孽”进行大清查。随即，全国上下便处于一种压抑、紧张甚至恐怖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们惶惶不得终日，他们更担心随时都有可能被工宣队拉去审查、关押。1968年8月，与冯康同在三室工作的兼职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董铁宝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关押在北大的28楼，不准与家人见面。

亲眼目睹曾经同在三室奋斗的同事被抓，冯康感到了剑拔弩张，他甚至感觉那些人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他有一个在美国的哥哥，又出身于一个封建幕僚的家庭，这些都足以成为他被关押的罪状。也许过不了几天，下一个被审查的就是他。凭着敏锐的感觉，冯康断定噩运正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在一种强烈的不安笼罩下，冯康连续几个晚上都彻夜难眠。出走的念头不断地萦绕在他的心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逃离这是非之地。

1968年8月3日早晨，趁着这个城市还没有醒来，冯康离开了住所。

如同梦游一般，他开始有些茫然，甚至没有想好周密的出走计划，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他只知道，他要离开北京，他必须离开这个依然让他留恋的城市，因为这里很危险。

后来，我们在冯康被迫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到他所描述的逃跑过程：“八月三日（星期六）晨约五时半离开中关村至黄庄搭31路车直达西直门，并从西直门火车站搭7点55分的西（直门）沙（城）慢车离开北京。后来怕西直门遇见熟人改在白石桥转55路（动物园至永定路），中间在半壁店下车转36路车（阜成门至门头沟）至三家店下车，步行到三家店火车站。买了三家店至风陵渡的火车票，该次车到达和离开三家店的时间是8点30分左右。原来定的计划是由北京走沙线经沙城、大同、到风陵渡，过黄河转至宝鸡、成都、重庆。由重庆坐轮船沿江东下到武汉，转轮船至长江下游，或从武汉坐火车至浙江杭州或至江苏南京。火车于当日中午11点30分到达沙城，吃了一顿午饭，于下午2点乘去大同方面的慢车。下午6点钟到大同站，没有出站，探明了大同至太原的车次时刻。当晚只有一班至太原的车，10点发车。我已在候车室排了队。听旅客说风陵渡可能不通，风陵渡以西陕西境内有武斗，可能有麻烦。又说风陵渡转宝鸡入川，看来路短，实际要多次换车，摆渡过黄河很麻烦，走西北线天气……

冯康的上述“交待”写得混乱，甚至有些矛盾，比如说准备从武汉坐火车去杭州，当时这条线的火车应该没有开通。也许是被逼无奈，也许是有意写得矛盾，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冯康最终还是选择了走西北线。他先跑到银川，后来又经兰州、西安，最后辗转到达苏州。

冯康抵达苏州后，已经是心力交瘁。踏遍了半个中国，舟车劳顿已经让他体力严重透支，身上的钱也几乎用尽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

几个月来，苏州一直是他魂牵梦系的地方，是他向往温暖时可以栖息的地方。在苏州，他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故园的气息依旧，故乡的记忆犹存，可是父母早已西去天国，姐姐也是天各一方，家没有了，苏州还是那个可以给他安全与祥和的天堂吗？

悲怆中的冯康突然想到了死，他买来安眠药、绳索和刀放在袋子里。其实，他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只知道长眠故乡是他能够作出的唯一的凄美抉择……

这一天，他来到寒山寺，那是他儿时与哥哥、弟弟最爱嬉戏玩耍的地方。他想再次听听那空旷、悠长的钟声，那将成为他告别人世最动听的挽歌……

正当冯康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时，计算所有两位工作人员正好出差路过苏州，无意中他们在饭后的散步中看到远处的一个人很像冯康。因为隐约之中觉得北京在通缉冯康，所以他们立即和北京的计算所联系并得到证实，北京方面随后迅速派人把冯康押解回京。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与巧合，也正是这些偶然与巧合，让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的精彩与波折。冯康后来自己也想不清楚，计算所同事的出现究竟是祸、抑或是福？如果没有这次戏剧性的相遇，冯康的人生故事恐怕在苏州就已经结束了。

#### ◇ 七国“特务”

冯康由苏州被押解回京后，被关进“牛棚”里，也遭到红卫兵批斗。他的罪名是“七国特务”，包括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美国特务等等。

冯康之所以被冠以“国民党特务”源于他读高中时参加过的军训。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内忧外患。蒋介石为了加强政府内部控制、对日备战和镇压中共运动，1932年3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他本人亲任复兴社社长。复兴社也是后来军统的前身。

复兴社成立之初，主要活动包括开设由戴笠和郑介民负责的特务培训班、孙常钧负责的宪警训练班、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等，培养嫡系力量。其中军委会政训处在各省开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当时江苏省和上海市的高中学生很多在集中军训时都参加了复兴社，但并不等于参加者就是军统特务。实际上，学生们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受到蒙骗参加了特务的外围组织，但并没有进行任何特务活动。

1935年，冯康读高中时参加的军训，正是由“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组织的军训。军训的地点在镇江，军训的负责人叫王敬久。王敬久在军训中发展了一批学生作为复兴社的社员。冯康因此被当作是复兴社的社员。后来冯康就读的大学又是国立中央大学，这也成为文革时期需要冯康交待的重要事件。

除“国民党特务”之外，“苏修特务”的恶名自然与冯康那段留学苏联的经历有关。至于“美国特务”，冯康一早也预料到，大哥冯焕在美国，他怎样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冯康的家被抄了，仅有的两居室也被人占去了一间，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冯康一直都是与人共住一个单元。

冯康被关押在所里，不能回家，只能被迫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

关押期间，冯康昔日的同事董铁宝自杀了。1968年10月18日，接受“隔离审查”的董铁宝在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被关押的北大28楼，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董铁宝当时的罪名是“美国间谍”。

当时北大的数学系教师，后来出任北大校长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在他的《自述年谱》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打击面相当大，死人最多。当时还死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搞计算数学的，被整得太厉害了，就自杀了。这个人在美国军事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回国时带回来很多材料，在美国都是机密的，他业务很强，英文也好，当时搞计算数学的人都很重视他。”丁石孙所说的这个人就是董铁宝。

董铁宝自杀后的第二天，三室的崔俊芝和王荅贤等人被派去董铁宝的家中查看是否有计算所的秘密资料，有无“间谍”罪证。崔俊芝回忆说，当时他看到董铁宝家里的情形十分心酸：妻子梅镇安在董铁宝自杀前请求与董铁宝见面遭到拒绝，同时还被要求与董铁宝划清界限；读中学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劳动；剩下年幼的小儿子因惊吓蜷缩在仅有的一间屋子……

董铁宝的自杀对冯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很难相信那个曾经跟他共事的、老实憨厚的同事竟然会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与恐惧，或许自己就是下一个董铁宝。

在冯康的心底对董铁宝一直有种尊敬，或许还有一种命运相似、“同病相怜”的感慨。文革后期，董铁宝的夫人梅镇安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明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请求照顾把儿女调回北京。她的信起到了作用。当其他同龄人还远别父母在农村时，董铁宝的两个孩子回到了北京，这也算当时因“归国华侨”身份受到的优待。文革结束后，董铁宝的家人陆续出国。

1992年，当董铁宝的夫人梅镇安回国时，冯康与时任所长的崔俊芝特别请她在北京知春路一间非常有名的豆花庄吃饭。席间谈到当年的境遇，唏嘘不已……

1969年的夏天，对于冯康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夏天，他被迫要求写各种交待：材料、被迫要求揭发身边的人。交待了还要交待，揭发了还要再揭发。严酷的审问与批斗，各种威胁与侮辱，还有那阵阵袭来的恐惧，那种对人精神与肉体接连不断的折磨已经让冯康看不到任何希望。心力交瘁的他感到周围漆黑……

冯康的人性防线开始被击垮了，他开始胡乱地、疯狂地进行交代，他承认自己是“七国特务”，承认一切莫须有的罪名，他甚至还要为自己编造一些罪名。

他在无奈的情形下又开始揭发他的家人，弟弟冯端、姐姐冯慧、姐夫叶笃正全部被牵连进来。于是，冯康的家人也遭到迫害。就这样，某一天，在南京大学执教的冯端也突然无端地被造反派在全系大会上点名，上台低头弯腰认罪。按照冯康的交代，他也有“美国特务”的罪名。此外许多和冯康共事过的清华大学的讲师、同事等等也都被“揭发出来”。

每天早上上班前，冯康要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计算所的大楼前“请罪”。造反派要求他们拿着扫把，当众念毛主席语录，低头认罪。批斗更是家常便饭。

那种黑白颠倒、人格扭曲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年左右，冯康因为“认罪”态度良好，交代的材料多而被从专政队放了出来。接下来的惩罚是在计算所扫楼道，坐小板凳。冯康没有了工作的地方，在计算所三室走廊内放置一个小桌，他每天就是要坐在小桌前写交代材料。

在计算所的同事中流传这样一个文革时期关于冯康的故事：石油部曾经有一个姓汪的院士，他遇到了关于石油计算方面的难题，算不出结果，有人建议他去找冯康。他去了以后，

在计算所的楼道碰到一个老头，坐在小桌前写东西，他就问那个老头，冯康的办公室在哪里。结果，老头回答道：“我就是冯康……”

虽然这个时期冯康依然受到屈辱和不公平的待遇，但至少他有了小小的自由，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969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共同召开广播通讯系统会议。会上不少部门反映天线太大，不易隐蔽，于是会议决定组织天线小型化的全国性会战，由总参通讯兵部牵头，中科院物理所是主要参加的科研单位。物理所派出1959年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郝柏林等参与，这就是“1019任务”。

“1019任务”的开始为冯康带来了新的转机。

#### ◇ 绝地逢生

1969年，计算所已经实行了军管，被编入军队序列，番号为京字116部队。于是，京字116部队派出了崔俊芝、凌连生、刘唐三个人参与“1019任务”。崔俊芝等的任务是和他们一起进行小天线电磁场计算。在工作中，崔俊芝很快发现遇到的物理难题比较多，他们找来了波波夫的电磁学和高等物理学等书阅读。亚历山大·波波夫是俄国物理学家和电力工程师，是研究电磁波的先驱，也是无线电的发明人之一。尽管阅读了书籍，但以他们三个人的物理背景很难解决遇到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难题，就无法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这时候，崔俊芝想起了冯康。他了解在计算所，只有冯康有着深厚的物理背景，并对物理非常感兴趣，这些难题也许在冯康手里可以迎刃而解的。于是，崔俊芝冒着政治风险向军代表和工宣队建议，让还在坐“小板凳”的冯康来协助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军代表和工宣队采纳了崔俊芝的建议，但附加条件是不能影响冯康“交代”罪行；冯康只能做理论部分：工作方式只能是崔俊芝和冯康进行单线联系。

从此，崔俊芝当上了冯康的“领导”。他每天早上八点给冯康布置“作业”，预先写好一个公式，让冯康进行推导，下午六点让冯康交“作业”。崔俊芝每次和冯康交谈都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样的“互动”方式大概持续了近两个月，冯康认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作业”，有效地保证了小天线计算的顺利完成。

崔俊芝现在回忆起来说，自己当时也很害怕，他不知道冯康的问题究竟将会怎样，也不知道和冯康接触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就是那些“作业”给当时的冯康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安慰。

“在冯康看来，自己问题并不大，尽管他交代自己是七国特务，但上级还找他做事。他隐约通过给他的问题了解到自己正在做的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形下，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光明与希望。”

冯康参与“1019”任务所作的工作是秘密的。他参与的主要工作是研究麦克斯韦尔(Maxwell)方程及其差分格式，处理其远场边界条件；分析亥姆霍兹(Helmholtz)方程及相应积分方程的性质，核对亥姆霍兹方程的差分格式及其远场边界条件等。对于当时“10

19”任务组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神秘人物”正是被诬蔑为“特务”、天天坐“小板凳”的数学家冯康。

冯康后来称这段经历是“他在最不幸的年代里度过的最充实的时光”。他也因此和崔俊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七十年代初，中国开始研究和实现计算机设计自动化，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集成电路的自动布线，也就是把印刷线路的布线从人工变成计算机自动完成。这项任务由刚从“重点审查人员学习班”解放出来的黄鸿慈负责，冯康也参与进来。由于海外背景等各种原因，1969年开始，黄鸿慈、黄兰洁、李家楷等六个三室的科研人员被“送进”重点审查人员学习班，整天学《毛选》，交代问题。这次能被放出来，黄鸿慈等很珍惜这个文革后的第一份工作。黄鸿慈回忆说：“那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包括方案的制定、程序的编写等等。”冯康不仅参加了方案的讨论，还用汇编语言写了部分程序，这也是冯康生平的第一次编程，但已体现了很高的编程技巧。冯康参加这个工作约有半年时间，这半年的“布线”工作，也是其文革中第一次公开在办公室工作。而黄鸿慈一直为布线连续工作近三年，直至1972年又被送去天津出小站米的小站去劳动改造了一年多。

1971年9月13日，准备出逃苏联伊尔库茨克的林彪等人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国境内的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丧生。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九一三”事件，也称为“林彪事件”。“林彪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分水岭，很多人开始冷静思考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和后果。

“林彪事件”后，关于冯康的“历史问题”也便无人问津，冯康逐渐恢复了自由。

#### ◇ “蛰伏”六载

1971年到1974年，这四年时间是冯康低调的“蛰伏”期。尽管不再受到“专政队”的管制，恢复了自由，但他却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家中原有的两居室被“专政”去了一间，剩下的一间更为狭小，于是他就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

冯康那时候经常去的是计算所南楼的计算所图书馆和计算所西门口的中科院图书馆，有时还会“偷偷地”跑去城里的王府井图书馆。

那时崔俊芝家住南苑机场附近，平时不天天回家，因此他与冯康在中科院图书馆碰面的机会就很多。经常在图书馆碰到的还有从事最优化研究的席少霖。林群也是和冯康在图书馆碰面较多的一位。

林群，1956年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数学所泛函分析组工作，他与冯康的相识源于数学所为年轻大学生举办的数学研讨班，冯康是他的指导老师。冯康调到计算所后，两人仍保持密切的联系。有时，冯康甚至更愿意找这个计算所的“局外人”探讨一些数学问题，偶尔也会同他针砭政治时弊。林群说，文革后期，他经常在王府井的书店遇到冯康。那个时候，作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好多人见到冯康都躲开、甚至装作没看见，而他每次却会主动上前向冯康点头致意。或许正是那种在“非常时期”的敬意，让冯康心中分外感激，也使得两人默契的友情一直得以延续。

除了在图书馆看书、做笔记之外，这期间，冯康也在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在他看来，有限元方法的研究虽然开了个好头，但大量的实践及延展的工

作还需要继续。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已经中断了他的研究，让他错失了一段研究的好年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必须要广泛积累、蓄势待发。

1970年开始，有限元方法的推广与应用在全国兴起。以中科院计算所为龙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有限元学习班、研讨班如雨后春笋，红红火火。

1972年，计算所举办了中国第一个有限元方法学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参加，原计划的主讲人是崔俊芝和杨真荣两人，杨真荣用有限元方法成功地解决了新丰江大坝的动力分析。崔俊芝为此次学习班专门编写了题为《平面问题有限元方法》的讲义，但实际的主讲人是冯康、崔俊芝和杨真荣三人，其主要理由是考虑冯康的学术地位，提高学习班的水平和影响。

学习班结束后，冯康对其讲稿进行了较大的扩充，撰写了“有限元方法”一文，发表在1973年的《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后来，计算所又让冯康和崔俊芝到清华大学去做报告。由于当时冯康还没有恢复工作，因此让冯康担任主讲人是战战兢兢的。计算所经过研究同意让冯康“出山”，担任在清华大学学术报告的主讲人，做出这一重要决定的仍然是冯康在三室的好搭档——张克明。

终于，冯康又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人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聆听这位计算数学大师的谆谆教诲。

沉寂了六年的冯康又“复活了”。

这次演讲对于冯康来说也如沐浴了严冬中难得见到的一丝暖阳。随后，他与计算所三室有关人员一同应许多部门邀请到各地举办讲习班或学术报告会，为有限元方法的推广和普及做了大量工作。

1974年，冯康正式恢复了工作，随后也恢复了学术专家的地位。

1974年8月，由负责电子工业的四机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简称）牵头召开了计算机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748会议”。会议提出了“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启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加速了计算机中文文化的进程。在这次会议上，冯康作为中科院的主要报告人，已经成为大会的“主角”。“748会议”成为冯康恢复专家地位的标志。在此次会议上，从小站劳动回来不久的黄鸿慈作了“从几类典型问题的误差分析考虑应用于科学计算的计算机字长问题”的报告。

此后，冯康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会议的报告席上。

1974年，冯康在计算所做了一个关于变分不等式问题的大型报告。1975年，他又在计算所做了一个关于应用数学发展方向的报告。来自北京数学界、物理界和力学界的200多位学者坐满了计算所的阶梯教室。在报告中，冯康讲到了“孤立子”（Soliton）、混沌（Chaos）以及突变（Catastrophe）的数学理论。他在报告中从物理问题出发，谈到了物理与数学的关联性，并强调数学只有保留物理的特征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由于他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跨学科的“孤立子”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震撼与反响。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听过冯康的报告对其他人说，仅凭这个报告中关于孤立子问题的阐述就可以推荐冯康做物理学的院士，足见他对于冯康在物理学方面深厚知识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冯康的这次报告可以说是开创了数学界进行跨学科报告的一个成功典范。学者们非常敬佩冯康的自信、胆识与魄力，更钦佩他敏锐的科学触觉与广博的知识积累。令学者们着迷的还包括冯康个人演讲的魅力。许多听过冯康报告的人都说，听他的报告是一种享受，冯康思路清晰，语言又极具有煽动性，听后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这次报告对中国孤立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导了一些新的学科方向。而在冯康看来，这只不过是他文革后期大量阅读后的积累，经过数年蛰伏后——一次能量的释放。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举国齐哀。人们原本以为世界会就此停止运转，然而生活继续依然。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一场在无数国人心中留下累累伤痕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落幕。

1977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并由其主抓科技与教育工作。8月4日，恢复工作仅仅10多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并主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规格极高，范围极小，参加会议的33名代表都是当时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精英和骨干。冯康作为科技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后来，冯康和交往密切的林群还聊起这段往事，他说通过这次会议他对邓小平非常钦佩，觉得邓公的确高人一等。“会上许多科学家们都在诉苦，讲述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邓小平只说了一句，‘我也受了很多苦’，他希望大家还是往前看，怎样把科学发展好”。

文革结束后，国家逐步走上了恢复经济建设的良性轨道。冯康捕捉到了这个发展经济的主旋律，也开始思索如何让计算数学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了更好地推广有限元，他带着王荃贤等人到全国的一些主要大学，举办有限元的学习培训班，讲授有限元方法，并为在全国普及和培养有限元方面的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陆陆续续在国家的石油部、地矿部、化工部、水利部等应用部门办学习班，推广有限元方法的应用。这次给他担任助手的是1961年由他选派到科大，之后一直留在科大任教的石钟慈。尽管70年代初石钟慈随科大迁址来到安徽合肥，但他与冯康一直保持联系。

在近三年推广有限元的工作中，冯康积累了大量有限元的讲稿与资料。1979年夏天，石钟慈在北京将冯康的讲稿加以整理，连同冯康已经形成的数学理论和有限元思想，编写成书。这就是那本冯康与石钟慈合著的《弹性结构的数学理论》一书。这本书198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应用数学方面具有影响的系列丛书之一。数年后，著名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将此书译成英文并和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康还主编了《数值计算方法》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近十几年计算方法的新发展，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一个经历过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对于每一个经历过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段深藏心中滴血的记忆。完全颠倒的世界、残酷扭曲的人性，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与亲情。

十年恍如一梦，冯康后来也不清楚为什么突然间运动就会袭来，突然间整片天就黑了下来，他甚至怀疑那个叫冯康的所做的一切还是不是自己。既然无法改变历史，他只能在历史中随波逐流……

当历史的阴霾逐渐散去，春天正悄然走来。而此时的冯康也已年近花甲、两鬓斑白……

〔本文作者：汤涛，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英国里兹大学应用数学博士。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数学讲座教授。姚楠，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香港浸会大学媒体研究硕士，现任职于香港浸会大学。〕

□ 来源：微信号《赛先生》2020年7月27日，转载自《数学文化》第一卷第3期

~~~~~  
【往事非烟】

梦忆巫山

• 王 康 •

## 1，水牛九队

1970年11月20日，我与陈万伦、赵玖华、冷代云、张碧银、赵华清、匡世明、匡世丽等人乘卡车沿巫峡口南岸山路盘旋而上，群峰环绕，长江如带。我们在官渡区铜鼓公社下车，由武装部长和供销社主任分配，我被带到水牛大队第九生产队。当夜宿生产队社员家侧屋。天冷，木床铺上两尺厚谷草，像睡在马槽里。看了二十来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昏昏然睡去。

第二天搬到生产队晒坝边的仓库偏房。风垭口，海拔两千米左右，对面矗立高山一座，酷似珠穆朗玛峰，农民呼为“暴风山”。夏冬两季常起飓风，不长草木，巨石断壁森严。生产队以高姓为主，二百余口，水田旱地一百余亩，一爿大屋场，住百十号人，其余散居。队长姓高，志愿军转业，满脸风霜，大清早就立在屋场石板中央，大喊“开工啦”。各家自带干粮，每天歇稍三次。最高一块地轮流种土豆和红薯，太阳落山时收工，队长快快一声“收活路啰”，接着总要咕噜一句：生产队的活儿做不完啰。

太阳西沉，霞光穿过云层，直射远方高台（高唐），万丈绝壁金碧辉煌。“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其无畴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岩而下望兮，临大阬之蓄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滂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宋玉天纵之才，也难摹巫山高唐万千气象。但是农民世居此地，早与天地一体，物我双忘，无惊无诧矣。

不知何时，为腾出耕地，高地劈出垒石坟岗。“仰视山巅，炫耀虹霓。俯视峥嵘，室寥窈冥”。葬身绝顶，俯仰天地。山民英明，远胜君王。

## 2，三次成贼

逢五小场，逢十大场。农民赶场，换回盐、火、煤油，添置农具，知青则寻机饱餐，聚议逸闻。一彪形大汉出现，在狭街陋衢，高人一头。有人介绍，是安徽十二军军长之子。

于是进食铺对饮，始终没有弄清楚是国民党十二军还是共产党十二军。其人文雅讲礼数，嗓音低沉。旁依一女，姣好娴静，酒毕即斟。他们好像住在远山里，1960年代即被驱遣，先我们好几年。以后再没见面，偶尔想起，不禁唏嘘。大汉若在，有七十开外了吧。

某次赶场后，七八知青走出场口，沿公路缓行，高声喧哗，突然有人大声哭诉。一村妇披头散发，泪流满面，穿过众人，直到目前，一把抓住我衣领，呼叫：“还钱来，还我钱来！”一阵询问，她在场上卖一只猪仔，准备扯段布做被子，钱却不见了。有人说，路上那个光头就是摸包贼。光头就是我，那年夏天干脆剃了“白沙”，晒得黧黑，貌似土匪。妇女称钱有五块，我口袋里本有两块，赶场吃了两碗面，还剩一块多。正拉扯间，跑来一小孩，手里捏着钱票。原来妇女怕偷，塞进小孩裤兜，小孩跑开，母亲情急中以为遭窃，于是有扭住光头一幕。

事过月余，某日下山乘白木船涉江到巫山县城。船到中流，忽然有女声在船头抽泣。预备靠岸到码头购往双江轮船票的20元上船时丢了！我的脸马上变红，表情古怪，全船30余人都转头盯住我，那妇人从人堆中慢慢挤过来。紧要关头，有人大喊，身上掉下来的不是？众人都低头，果然妇人身后几张五块钞票刚刚委地。妇人破涕为笑：差点冤枉你了！

再过两个来月，与陈万伦到官渡区，路经一屋场，突然有人大声喊：偷瓜贼！偷瓜贼！其时万伦也剃了光头，有空就用英语背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当时他正在一边背诵，一边系鞋带，猛地被人喊住，气不打一处来：喊什么喊！很快闪出几人：拿绳子来，捆他一索子就老实了！原来此屋场附近的南瓜近日被偷走好几个，我们两个光头经过，嘴里伊里哇啦，十足窃贼样。已被围定，心想这次怕跑不脱了。陈万伦突然大声问：哪个瓜？几人看去，确实不见瓜影，只有一地茎叶。“怕是搞错了，昨天这块地就收获了。”（巫山农民用词文雅，几乎不骂人，说谁“调皮”，算很重的抨击）一个农民恍然大悟，另一个马上对陈万伦说，你刚才呀呀呜呜什么？“老子背的是马克思语录！”转身赶路，陈万伦大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古人有理！一农民不善罢甘休，拉住我，某家的狗被人牵走，那人有点像你？我撒腿就跑，喊陈万伦：快跑，农民跑不快！我们跑到老远，几个农民还在原地打望。

三次被当成窃贼，众人皆清我独浊，莫非我真像坏人？人曰，光头不光头无所谓，农民十之八九光头，关键在你这副模样、神情。我这模样惹谁了？王康，你与众不同啊，一看就有反骨。问曰：农民懂什么反骨？答：农民最懂骨相，你这秃脑门，窟鼓眼，就像美蒋特务，比贼娃子还坏。

### 3，越界抢柴

巫山与张家界接壤，自古林莽葱郁。1958年大炼钢铁砍伐殆尽，农民食不果腹，还缺柴火。在河梁、邓家山区有几个煤窑，全供区、社干部，农民做饭煮猪食，主要靠玉米秆、薯藤、茅草，断火时只得“越界抢柴”。

官渡区早已无柴可砍，只能到湖北建始土家族境内“抢柴”。经常发生斗殴致残致死，农民因此成群结伙而行。我随生产队青壮年抢过两次柴，都没有遇到土家山民围剿。但实在辛苦，农民称“小死”。

凌晨四点左右出门，月黑风高。工具是砍刀、斧头和铅担。铅担两头用铅皮包成锐利尖头，中间是结实棉扎的杂木扁担。铅担可插进柴捆，必要时也可作武器。大约十个小时到山

林，潮湿的桦树、泡桐和青杠，拳头粗细，远未成柴。农民一边砍一边叹气：作孽啊，都没长成！

青年樵夫一担可达180斤，壮年者也有140斤，我把150来斤扛上肩时，心里告诫自己：管他娘的，这一挑可烧两月，拼命也要盘（搬）回去。队长走前头，本队最好劳力高天春断后。回程三分之一处停下，各自打开布兜，塞几块土豆、咸菜充饥，又走。关键是换肩，左右肩头轮流替换，重量也就左右分担，可走长路，不觉累。借着汗水润滑，右手扶担轻推，左手反手巧拨，肩、腰、腿随势扭动，大约二三里路左右换一次肩。

最难是九道拐。从山脊到沟底约十里，越走越低越陡，上山易下山难，但闻所有人都喘粗气，咬牙切齿，草鞋在沙砾间嚓嚓响，队长边走边叫：稳起稳起！高天春在后面呼应：盯到盯到！到最后两道拐时，一行人停下，山下干涸河谷里，十几把火炬照红山麓，是妇女小孩们来分柴了。到得谷底，男人们纷纷躺下，女人小孩忙着把高粱饼递到手上，再解散柴捆，插在小铅担上。男人们边咀嚼边爬起来，他们不能真歇，否则站不起来，走不回家，还有一大面坡好几里路！

最狼狈的是我，两个肩头已磨破，脚下也打了泡。队长下命令，王会计，帮老王分一半，你们是本家！王会计是女人，丈夫是小学刘老师，经常送咸菜豆豉之类来。终于走到晒场，谢过王会计，把两捆柴拖到门口，颓然倒地，倚门而睡，醒来时已大天白亮。

#### 4，彭大将军

生产队以高姓为主，彭永周却从未遭歧视。谁敢？老彭三十六七，人称“彭大将军”，熊腰虎背，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须，声浑厚性直爽，咧嘴一笑顿变小孩家。

我无论如何插不直秧苗，煞是丢人。老彭大步踩水过来，搬我头正对田坎，“先插五六苗，转过身，倒着走，手头不管，抬头看线！”还是歪歪扭扭，老彭哈哈大笑，“读书人，老王读书人！当不成我们农民！”

队里两口水塘，秋末放水灌冬水田，剩一塘淤泥。全队男女老少下塘捞鱼，捉黄鳝（农民不吃，没有油，赶场卖给街民）。老彭脱得精光（体格健美，不输大卫像），队长吼道：彭胡子彭大将军，你还是合适点！“老子又不日你！老子只有一条裤子！”高天新扯把树叶草丛，“你还是遮住！不见还有没有过门的媳妇！”老彭于是在肚子上围一串草叶，屁股露着，众人哈哈笑。

农民上工，要么把小孩放在地头田边，要么锁在家里。一天正在晒坝打谷子，我忽然看见底下屋场冒出浓烟。立即冲下去，撞开门锁，满屋烟火，一小男孩坐在灶炉前低声哭喊，绑在身后柱上。原来是老彭家！媳妇回娘家，老彭把三岁儿子锁在屋里，怕他乱跑，拿根绳子套牢。灶口火石掉出，引燃小孩脚下高粱秆……赶紧把小男孩抱出，烧伤不太重，但小鸡鸡灼坏了。老彭在高地干活，好一阵才冲回来，摔了几跟头，满身土泥血痕。他大叫一声，抱起儿子就跑。公社卫生所只有红药水，老彭抱子跪在马路中间，搭上去县城的卡车，县医院要排队挂号，老彭给医生磕头，血流不止，终于把儿子送进病室。

我不知道老彭的儿子医好没有，只记得这个彪形大汉抱着儿子哇哇大哭，如雄狮护幼仔，拼命奔跑的样子。彭大将军若在，该八十好几，儿子也已五十出头，孙子都成人了。

#### 5，舍命堵漏

1971年冬某日傍晚，队长把我叫去，递上一杯酒。水塘近日漏水，若不堵塞，到灌冬水田时就没水了。队里就你水性好，帮帮忙。

我一口应承。事情很简单，水塘中心有一根木头桩，不知怎么称为绿阴桩（当地人都称水塘为“绿阴塘”，编者注）。绿阴桩拔除即放水，堵上即关水。现在水下桩头出现裂缝，渗水越来越厉害。堵塞的办法是，在最近一侧岸边用竹篓装入泥土，泅到绿阴桩，再顺柱潜下，把泥土倒进裂口处。如此这样，大概三五次解决问题。队长特意说，算两天工分。答曰：小事一桩，半天搞定。离绿阴桩最近的堤岸大约三十米，一篓泥土约八十斤。没问题，算来回五次，等于挑一百斤担子走三百米，水深三米，潜水上下五次共三十米，小菜一碟。

气温零度左右，水面有一层薄冰。十来人站在岸边，我在岸边脱光衣服，只剩短裤，伸臂弯腰预备活动一通。队长把盛满泥土的竹篓放下，我提着下岸，右手挽篓，左臂奋力划水，篓土太重，即刻没顶，赶紧松手回游上岸。队长说，减半吧。我说，六十来斤。游出不到五米，又沉下。有人说，拿块木板，推过去，哪里能靠蛮干！

大大低估了潜到水底倒土堵塞的难度。水下睁眼，浑浊难见究竟何处渗漏。水下十来秒就呼吸困难，水温太低，氧气不够，必须尽快升上水面。结果来回十多次，每次冲出水面，感觉就要断气，像鱼一样张大嘴吸气。队长在堤岸下看，“还在漏！”最后一次升上水面，几近昏厥，勉强抱住木桩，再用残余力气游到岸边，马上昏过去。醒来时，已是第三日晚上，整整睡了两夜两天。头剧痛，耳鸣眼花，小死一回。

究竟堵住没有，我至今不知道。只是想，如果我不在，农民们怎么堵塞漏水？我已经离开那里44年了。

## 6，灭顶之灾

为节省柴火，一星期煮一次饭。土豆或红薯，洗一撮箕，倒入大铁锅，加水盖严，加几把火，再慢慢煨熟。

1971年冬，第二次抢柴回来，把最湿的泡桐砍短成捆，塞进灶膛，让余烬把它们慢慢烘干。

当晚看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入睡前，灶上传出土豆闷香和湿柴的青烟，没多想蒙头睡去。不知几更突然醒来，满屋火光烟雾，灶上火苗似已冲上茅草屋顶。神经病一样跳下床，赶紧提起木桶，满桶水泼向灶台，大团水蒸气顿时腾起，铁锅发出崩裂的爆裂声响，屋里一团混乱。脑子随即清醒：烘干的木柴烧穿了锅底，烤焦了土豆，最后引燃楠竹编的锅盖。第一桶水虽然胡乱泼洒，但方向没错，还有一桶水，要泼到要害处。遂用木瓢一瓢瓢对准火芯，火势渐弱，危机过去。

如果烧穿屋顶，旁边装盛种子的谷仓就将起火，生产队明年春耕就没有指望了。屋顶烧穿，连带屋梁垮塌，我自己这条小命就赔上啦。

屋顶终究不见了。

还是那年冬天，连续十余日，天空彤云密布，暴风山上数十条铅灰色云停在山腰，足有两天之久。我站在晒坝上，久久打量它们，这些巨大鲸鱼或潜艇似的家伙，怎么就不动了？

不久开始起风，暴风山的云层如幻影聚集流散。那日看《海底两万里》到深夜，拧灭马灯时，但闻屋外风雨交加，心想明天大概一片白茫茫吧。

天亮时醒来，发现屋里出奇亮，定睛看，屋顶没了！

一夜朔风，不知何时，屋顶刮飞到晒坝下方十来丈处。一间没有屋顶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像丢了天灵盖——其实就少了屋顶。蚊帐上，地上，灶台，都铺了一层厚雪。起身穿衣开门，果然白茫茫一片银色天地！暴风山顶，悬崖绝壁间黧黑斑驳，铁灰交错，天空宁静湛蓝，好一派俄罗斯原野的景象。

## 7，王师傅

王师傅一看就不是本地人。个头不高，但结实精干。四十来岁，额头上皱纹起伏有致，似藏着许多隐秘。他在暴风山下一道河湾开一磨房，水车日夜汨汨旋转，柴油机轰鸣。轧面条，榨油饼，舂谷米，收费比官渡区上另一家便宜许多。关键他心肠好，老人妇女来，他总要帮着背米提面送好远一程。谁也不知道王师傅全名，从哪里来，娶媳妇没有，他以前做什么。

知青组织宣传队，演《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之类样板戏，顺便混农民一顿好吃好喝。1971年夏天某日演到老王的机房，观众就他一个。演出刚结束，老王就端出一大钵鸡蛋面，分在六七个碗里，“鸡蛋早准备好了，唱阿庆嫂时，我就进去下面。”老王说，他到过印度，打日本鬼子，叫远征军。又到过朝鲜，“抗美援朝”。他不想讲抗美援朝，说“很惨”。你们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知道苏联歌曲与俄罗斯民歌的区别吗？《黑眼睛》《白桦林》《悬崖》，苏联歌曲没有俄罗斯民歌好，生命力不强，但比中国歌曲动听，歌颂爱情、友谊。会唱美国歌曲吗，美国黑人圣歌？“黑人圣歌？”也给你们唱支歌，在印度时学的。有人一直紧张，现在有些坐不住了：这王师傅是何许人，鸡蛋面这么丰盛，又唱美国歌曲，他安的什么心？还去过印度、朝鲜。

我生来喜欢逆经叛道的人，羡慕与众不同的谈吐，王师傅的危言耸听句句投我心臆。八亿人唱八个样板戏，太可悲。陈万伦跟我一样，他的眼光在说，王师傅就是危险人物，又怎么样？

有时目光具有灼人的力量，我和万伦都有闪烁的目光，加在一起，常人很难招架。其实王师傅知道知青们的心思，他大概就是要让他们开眼界，破除恐惧。

几个人没有回过神来，王师傅已经唱开：

马车从天上下来，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向约旦河那边我看见了什么，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有一群天使下来迎接我，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马车从天上下来，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我的灵魂仍向往着天堂，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

掌声猛烈响起，是我和陈万伦的掌声。

我们俩留了下来，其余几个人急急离开，王师傅送到水车旁回来。

他把我们领进屋，从窗帘后木盒里取出一部收音机，拉开天线。他拧开旋钮，逐一介绍国外的电台。他到印度打日本，参加的是“国军”，后来被“共军”俘虏，参加韩战。

他没有到过西方，但他跟美国军人并肩作过战，又跟他们为敌作过战。《马车从天上下来》是在印度时，一名黑人士兵教会他的。在朝鲜，美军随军牧师有许多祈祷和安魂歌曲，《马车从天上下来》是其中之一。美军飞机撒下的传单写道：我是一名黑人士兵，一百年前我的祖上是奴隶，林肯总统为解放我们而献身。今天，我们为全世界被奴役者而战，天使将驾着马车下来迎接我们。“所以，我愿冒险把这首歌献给你们。”

某日，各生产队喇叭响起警报声，号召抓捕反革命王某某。武装部长、干部和民兵高举火把，持枪冲到那座机房时，全都站住不动了。河谷洪水滔滔，水车、磨房已荡然无存……

□ 原载《南方周末》2015年12月25日

~~~~~

【不堪回首】

## 陶铸之死

• 曾 志 •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以后，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但元月二十日左右，往后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又过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三十六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也进来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〇”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〇”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陶铸似乎已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三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什么人往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

曾云说：“不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没有理我。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人。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卅”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犯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

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

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苍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正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卅字廊前花木森，  
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  
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一九六九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

一九七〇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  
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  
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  
头颅惨白不成妍。

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三百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拚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拚了。”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六十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

“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一九六九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三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三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

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三〇二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三〇一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

陶铸又被从三〇二医院转到三〇一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四千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

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早上七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对我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那就十八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像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十八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之了。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四十三天时间。

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走马上任，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卅”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蔡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已经去世三十个春秋，然而那些如烟的往事却时时飘荡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房里。透过岁月的风尘，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而且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不时觉得，陶铸也许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仍然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们的心中。

□ 选自《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

## 【冷暖人间】

没有家的日子

• 罗点点 •

他的话使他们枯萎的意兴重振，凋零的希望复苏。——弥尔顿：《失乐园》

1970年冬天，当我和朵朵在生产队请准假回到北京城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家了。一家九口，爸妈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猛猛三个住监狱，朵朵、我还有弟弟了了三个下乡插队，大哥、大姐和二姐三个在外地工厂做工。是个整齐的无家三三制。组织上的说法是：北京没有人，所以不必再安个家嘛。所以，有没有家完全听从革命的安排。

毛毛说，住我们家吧。毛毛说的家不是原来中南海里的家了。邓小平夫妇此时被隔离。但是他们家里有个奶奶。这个老太太既不能上山下乡，不好去工厂做工，也不合适安排到监狱里去。所以，中央办公厅给他们在宣武门外找了两间平房，让老太太住下来。

奶奶精神矍铄，面孔和善，一看就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对我们来说奶奶家里永远有干净的床铺和热腾腾的饭菜。推门进去或开门出来，身前身后永远是奶奶善良安静的眼睛。尤其奶奶做的四川菜在我们来说是世上无双的美味佳肴。住在这里会忘记外面的寒冷和动荡，因为奶奶脸上总有压倒一切的气定神安。宣武门外方壶斋里两间温暖如春的小平房，在中国最乱的时期之一，在我们没有家的日子里，带给我们的安慰和镇定使我终身难忘。一个像奶奶如此善纯淳朴的人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我终生需要认识和理解的事情。

那时候在和平里住宅区有一幢五层居民楼，附近的人都叫它“黑帮”楼。因这里住着一些“黑帮”的家属而得名。所谓黑帮，不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杀人放火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帮派组织，而是那个年代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别称。住在“黑帮”楼里的孩子，和我们年龄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尚有一些原因使革命给他们在北京城里留下一个落脚之处，而不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有家。这个地方很热情而自然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的真正基地是林枫的儿女们的家。林家住三层，同一个门洞里的五层是乌兰夫的女儿们的家。两家鸡犬相闻，高兴时两家加上两家儿女们的朋友统统合成一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喝汤。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饭刚做熟，一大帮客人拥进门。主人头皮发乍，但绝没有把人饿着的事情发生。“黑帮”楼里最经常的饭菜品种是炸酱面，面条可以随时下锅，炸酱可以随时加盐。大家公认当年在“黑帮”楼里吃过的咸得发苦的炸酱面是最令人回味的。

经常在这里出入的孩子都是家里有“问题”的，他们的父亲都是当时一些最著名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吕正操等等。这些孩子们当时都是15岁到18岁的样子。在一起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尤其是林枫的女儿林京京，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带着九岁的妹妹，靠着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过日子，这种“黑帮”子女领的生活费是由国务院管理局从父母冻结的工资里扣出来的。京京还要定时去看关在少管所里的，此时害着严重肺病的哥哥林炎志。提到这个少管所还得提上两句，少管所在北京西苑，全名叫北京少年犯管理教育所。不知这个机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文革中这里成了关“黑帮”子女的地方。据我知道，先后在这里关过的人有许多，年龄最大的是文化名人邹韬奋先生的儿子、叶剑英元帅的女婿、曾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

京京的家，是所有没有家或者有家而不愿意回家的“黑帮”子女的乐园。不知道她操持家务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反正只要进了她的门，她就有本领让你吃饱喝足，抽烟的人还可以找到不错的烟抽。但你要以为她是个只会操持家务的温柔女孩就大错特错了。京京更多时候是个琴心剑胆，义海云天的女侠形象。

文革时，走资派是第一专政对象，这个楼里的“黑帮子弟”自然是管片儿民警第一注意的地方。凭良心说，管这片的民警是个相貌挺不错的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只因为下巴较长，就被我们起了外号叫“手枪把儿”。手枪把儿有事没事的，老到京京家来。看到他不

顺眼的，或者面孔生的人就带到派出所去问话。想来他没有真正为难我们，顶多是带去问问话，又放回来。有时他还会问问这些孩子们的爸妈的情况，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虽然并不真正怕他，但是却很讨厌他，因为他老是显得很无聊，让我们觉得他来，或者带人走，仅仅是因为他很寂寞。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有一次他来查夜，警察来查夜都是深夜两三点钟，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听见敲门声，京京一个鲤鱼打挺儿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把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我拖到地上，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三把两把把我揉到一个离地一人多高的顶柜里去，又扔上来一个大包袱把我遮住，然后随手把柜门关上。前后只有一两分钟。等我惊魂稍定，京京已经开开门了。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心里非常紧张，大包袱更挤得我喘不出气来。但我依稀听到京京和他们说话，镇定安详，应对有度。临走好像还说说笑笑起来。但是也有叫手枪把儿得了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吃饭，手枪把儿上来非要把一个比我们年龄都小的叫席修明的男孩子带走。说起来也怪，修明可不是“黑帮”子弟，他爸爸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有共产党国家的重要领袖来华，比如胡志明等人，修明的爸爸都出来陪，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修明爸爸的名字。但不知道修明为什么老往我们堆儿里混。京京说他，人家没家住，没饭吃的人才来我们这儿。你老爸又不是“黑帮”，你有吃有住，干吗老在这儿混？修明不管，有机会就来。他觉得我们这里没有父母管，好玩儿。这天手枪把儿不知怎么看修明不顺眼，非要带他去问话，因为修明的爸爸仍是革命干部，所以他被警察带走大家都不真正紧张。京京更是虚张声势地在凉台上冲手枪把儿大喊：“你可看好了这小子，腿儿快着呐，溜了你可再找不着。”手枪把儿原来走在修明前面，听了这话赶紧走到修明后面去，我们则都在楼上笑得肚子疼。我们饭还没吃完，修明回来了。果然进了派出所，手枪把儿第一句话就问，你爸是谁？修明扔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过去，指着一则胡志明访华的消息，用当年很流行的短句式说：“自己找，我爸，姓席的。”手枪把儿在《人民日报》上找到了修明爸爸的名字，只好放修明回来。临走他也用短句式跟修明说，“别跟他们混，回家，听我的，没错儿。”后来见不到手枪把儿的面了，听说他去参加警察合唱团。我们就说手枪把儿不能站第一排，要不指挥一伸胳膊就碰着枪把儿了。现在想起来，手枪把儿不是个坏警察，他挺忠于职守，而且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他尽量使自己的所有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我们没有家，除了在京京家落脚之外，还到别人家里去玩。有一次，我到刘少奇儿女们的家去玩。他们家在北京站附近一个新建的高层建筑的十几层楼上，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了，不仅房间布局合理，他们的房子里还有非常贵重的家具，听说是他们外婆的，由于是私人所有，所以允许他们带出来。那一天停电，电梯停开，我兴致不减地拾数百级而上，敲门进去，像进入了什么漂亮宫殿一般。记得那天他们家大姐爱琴，还有园园、婷婷、小小、爱琴姐姐的儿子索索都在。他们作为主人亲切周到，但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心不在焉。由于停电，房间里十分冷，一直到吃完晚饭，房间里的照明灯也没有亮。有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冷了场，这时我听见窗外一列火车驶过，我忽然觉得这火车很孤独，这么冷的天，它要开到哪里去呢。

园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点亮了几只蜡烛。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被重新倒满了葡萄酒，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园园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吃惊，震动，还是感动，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园园又说了一句话：“爸爸是革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这句话对我来说更如五雷轰顶。

自从三年前，文革刚刚开始的那个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以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以来，我从没有想过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

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事情。当然对我来说这中间还有很多的障碍，但我觉得从听到这句话起自己已经完全不同，心头放下了一副千斤重担，一股温暖的东西回到我的血液里。

从刘家告辞出来，夜已经很深。我的头脑仍然在轰轰作响，脚底下轻飘飘的，我惊异自己何以受到这样强烈的震动。一时间我不想回到任何地方去，只想在寒冷的空气中多停留一会儿。我走到台基厂附近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栋洋房窗户里的灯光，透过院落中密密匝匝的树枝，和一道矮墙，那灯光如此温馨又如此熟悉。我痴痴地看着它，忽然极其清晰地想起南池子我们那个温暖的家，想起我们家的院子和窗户。由此又想起音信全无的爸妈，想起了在学校里忽然失踪的猛猛哥哥和四散的兄弟姐妹。在这夜深人静时我泪流满面，充分体会到在万籁俱寂时分痛哭流涕有多么舒畅。三年来，我第一次为自己和自己失去的东西哭泣。我摸摸脸颊上冰冷的泪水，心中却倍感温暖。我又想起冰雪女王的童话故事。当她被人类之爱感动得流下眼泪的时候，她的冰雪心脏就融化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融化的冰雪女王，眼泪流下来，可心是温暖的。更重要的是我忽然明白从今往后我又可以听从自己良知的召唤，不必让那些僵硬冰冷的逻辑强迫自己。想到我的爸妈不一定是坏人，我的家根本不该失去，或者至少我有权利为我失去的东西难过，而不是和众人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天大的欢喜。

回到京京家已经很晚。京京给我开门的时候问：怎么这么晚？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她。京京看我的样子，赶紧说：我没睡，我是说这么晚了才来……我进去，为京京的体贴感动。京京给我拧了个手巾擦脸，我才知道我的眼泪竟然一路未干。

园园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可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

□ 摘自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  
~~~~~

## 【动乱年代】

### 解读“大杂院”

• 华新民 •

（为什么曾经敞亮的四合院经过这些年会变成这样？这些房子究竟属于谁？北京旧城保护人士华新民为我们叙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昔日的四合院改造得如今已很难辨认，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种北京胡同里：

这是一所典型的“大杂院”，坐落在北京东四十一条×号。从敞开的门往里面看，它完全是一座“贫民窟”：破败的老屋和后来填塞的红砖房挤在一起，当中露出一小点昔日的雕梁画栋。

再走进去，可以看到居住在这里的二十几个人，而我来探望的两姐妹，就藏身在这个人群当中，与其兄妹共同使用着院落里的四间屋子。事实上，整体院落都是两姐妹和其亲属的私家重地，但她们如今却不得不与外来的陌生人“分享”着这里恶劣的生存环境。

姐姐叫李憬，妹妹叫李怡，她们都是中老年妇女了。她们站在院子中间，向我用手比划着曾经在这里的美丽的两进四合院，形容着曾经茂盛的枣树和海棠树，以及已经消失的垂花门。

在那扇消失的垂花门的后面，我听到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仍然没有结束的悲惨的故事。

两姐妹的父亲叫李致成，这所占地四百六十多平方米并建有十七间半房屋的四合院，是他在1950年初购置的。当时李致成是在北京女一中教化学的老师，妻子主内，他们膝下有四个子女。住进四合院以后，又陆续增添了四个子女。一家十口与世无争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1951年，李致成被调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教生物化学，任副教授。由于他在化学实验和化学仪器的技术方面都非常出色，又在不久后调到北京医学院仪器厂，先后担任厂长和首席技术专家。自五十年代初期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间的这些年里，他在医学界里名气极大，全国各地在医疗仪器上发生高深疑难问题时都会求助于他，其中包括中南海和军队大院里的保健医院，在这些地方他也时常进进出出。

然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并没有能令李致成的私人住宅超脱于种种“运动”的旋涡之外。虽然新政权自1949年起，就宣布承认和保护被视为“生活资料”的城市里的私宅土地，但在1956年针对工厂和店铺等“生产资料”的“工商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又于1958年掀起了“私房改造”的运动：不触及整院的私人土地及自住的房屋，但政府要求业主把其拥有的用于出租的房屋，只要总面积达到了225平方米（各地标准不一，北京为此面积），就必须交给房管局来“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管理”。李致成在东四十一条的四合院，本来都是自家人住着，没有出租。

但是在1955年，政府因为缺少房源，便下文件要求业主尽量向外出租自家的房屋。于是他响应号召，让孩子们挤一下，匀出来了六个房间出租。没想到三年之后，出租房屋竟惹来了祸，总面积小的还可以躲过，总面积大的就必须把管理权交给房管局，所有相关业主都在街道上被开会“动员”。

李致成在十一条的出租房屋虽然不及225平方米，但因为其大家族在别的胡同还有房产，房管局便按着总房产去计算，结果令这六间房屋变成了被称为“经租房”的“私房改造对象”。经过几个月的“运动”，仅在北京，就有属于六千个家庭的二十多万间房屋被纳入了“经租”。自此，房主必须把所涉及的房租与房管局共享：每个月房管局扣下大约三分之二的房租，再把三分之一的房租返还给业主。当时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1954年宪法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条款，虽然“经租”并没有触及产权，但是侵犯了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

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李致成家私宅的产权证书，就裹在一个蓝色的包袱皮里，里面有三页内容：第一页上印着“房地产所有证”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的大章；第二页上是相关院落具体的占地面积，包括房屋和院中空地的面积；第三页是宅院的蓝图，也叫地籍图，上面标有地籍号。在1949年和1966年之间，所有在新政权的政府部门登记过的宅院都获得了这个产权证书，大部分是根据业主民国时代的房地契换发的，小部分是“文革”以前买了院子后获得的。



在包袱皮里，还收着一落税务局给的房地产税收款凭据，分别注有已经交纳的房产税和地产税的人民币数额。“文革”爆发后，李致成作为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医学院被残酷批斗，这个小蓝包袱被红卫兵抄走，东四十一条四合院的部分房屋也被红卫兵贴上了封条。不久后，一位叫初秀兰的街道积极分子过来撕下了封条，自己就搬了进去，还兴奋地对周围邻居们说：“我们也住住好房子！”与李家同一胡同的私宅，以及北京三千条胡同里的数十万所私宅，绝大部分在当时都遭到了红卫兵的抄家，很多业主被打死。业主们的房地契，有的像李致成的一样被抄走，大部分是在红卫兵的逼迫之下为保命而交给了房管局，私宅自此被房管局接管，统统被称为“公房”，用于出租的私人房屋也不许可再收房租了，包括与房管局共享房租的那些“经租房”。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陆续被安排住进了社会上的人，屋子里的木雕隔断给抹上灰变成墙壁，厕所被拆掉变成住屋……。

1968年6月底，当时与家人同住在北京医学院宿舍的李致成被“造反派”抓走，一个星期后又被迫害致死。李致成已经患了癌症的妻子也在不久后去世，留下了八个孤儿。李致成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见到父亲的尸体，直到“文革”结束两年后，才从医学院盛着福尔马林溶液的池子里找到——十年以来，负责尸体解剖的老师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把李教授的尸体保存在池底，以便孩子们有一天能够见到父亲的完尸。我在听着姐妹俩流着泪水的讲述时，简直无法想象她们当时的感受，无法想象她们心中的震撼和痛苦。

我知道，在北京的“大杂院”里，到处都深藏着类似的惨案。我感到无法接受的是：这些曾经受到“文革”迫害的业主的家族，本应受到应有的抚慰，却在“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生活在“文革”留下的磨难中，继续地受着煎熬——为了自己的房子，为了回不去的家。当1980年政府下达文件表示必须归还十年浩劫中接管的私人房产之后，当各地政府成了“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之后，那痛苦的一页本应就翻过去了，但它却没有翻过去，只是在页面上，红卫兵的语言逐渐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语言。

北京于1984年开始大规模清退私人的四合院，但是却没有归还“文革”劫难中劫走的“房地产所有证”。在此之前的82年12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对1954年宪法内容的修改，其中增加了这么一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应该是受这条规定的影响，而且是基于对其真实意义的误解（此“所有”不当财产权意义上的所有，而是政治及行政管理意义上的），李家子女在收回部分房屋之后，得到的是一个新制作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却突然间不见了。然而，政府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收千千万万民众的财产的。

所以通过其后的一系列规定（87年民法通则、88年宪法修正案、90年国土法规字第13号文和95年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又令城市私宅业主的土地产权以私人所有权“自然享有”的形式沿袭了下来。于是，自2002年开始，政府便开始向胡同里的一部分私宅业主颁发土地证，虽然其正式名称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从内容本质上看，相关土地的私有权利完全没有变化：意味着土地权属的宗地界址仍明确地标注着，而且此权利是无限期的。然而土地登记部门只是向部分没有“经租房”和其它侵权问题的四合院业主颁发了这种土地证，面对“大杂院”就做不出来了。这是因为宅基地的土地界址需要邻居签字认可，而每当土地登记人员走进胡同里类似李家的这些所谓“公私房产混合”的大杂院里时，就一定要触礁：没有一个“经租房”的业主会签字认可那虚假的“边界”！

姐妹俩向我表示：经租房的产权从来没有变更过，1997年以来广东等地区已经大规模把经租房“退还给产权人自行管理”，而彻底忘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北京和很多地区却仍未清退经租房，硬说它们已是“公房”，但《宪法》是适用于全中国的。

姐妹俩是拒绝“合作”的，多数住有合法产权人的“大杂院”都拒绝了不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原始蓝图的土地证。另外，曾经整院“经租”的院落在为房管局进行土地登记的过程中也被制止了。情况发生在去年，东城区房管局想把东四五条23号的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该院倒是没有房主自住的房屋，不是个“大杂院”，但房主恰好住在旁边的25号。房管局知道会碰钉子，便想蒙混过关，不经过指界就直接做了公示。但房主看到胡同墙上贴出的公示后立刻到土地管理部门做了异议登记，听说该事件后紧接着又有上百个房主也做了异议登记，包括李家人。于是北京市国土局下令停止为各区房管局登记经租房的土地，并就此向国土资源部打了报告。

一所小院是一片小的疆土，由几条街巷构成的区域是一片大的疆土。同样，大疆土的宗地如果没有众产权人的签字认可，按照法律也是不可被他人任意处分的，无论是遭“协议出让”还是被公开拍卖。在我们这里，“旧城保护”的命题哪里是建筑层次上的呢？它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对私人产权和现行法律的尊重与否。

目前，全中国的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的最后命运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规划师和建筑师都不要参与“旧城改造”的设计任务。有些钱是不能挣的，这会受到良心的拷问。老宅是会得到新生的，但只能靠它的合法主人来完成，我认识这样一些幸运的老主人，见过经他们自己修缮的四合院。希望不久后这种“幸运”能变成常态，希望李家兄妹也能同样地重返家园。

那时候，已经在天上的李致成教授，或许才能得到一点点的安慰。

□ 原载《Domus China》2010年6月第44期，转载自作者网易博客2011-01-07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